

公私领域之间：南丁格尔与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女性角色转变

白如钰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天津 300387

DOI:10.61369/SDR.2026020001

摘 要： 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进程深刻重塑了英国的社会结构与性别秩序。分离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将中产阶级女性禁锢于“家庭天使”的角色定位之中，而社会转型也为女性突破传统性别壁垒、走向公共领域带来了历史契机。长期以来，学界对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护理事业发展与人道主义精神，却鲜有从性别史视角，深入探析其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中面临的职业困境与个体抗争，及其实践对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女性角色转变的历史意义。本文以林恩·麦克唐纳主编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全集》为核心史料，结合同时代相关文献与研究成果，以南丁格尔的个人成长与职业实践为线索，考察其在家庭中遭遇的保障与束缚、其女性主义思想的内在特质与矛盾性，以及护理专业化实践对传统女性角色边界的突破。本文认为，南丁格尔的家庭既为其职业实践提供了物质、知识与人脉基础，同时也成为她突破传统性别规范的桎梏；她以护理职业化为核心，通过构建系统化的护理教育体系、职业伦理规范与公共卫生实践，打破了私人领域属于女性、公共领域属于男性的二元性别对立，为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女性开辟了兼具专业性与体面性的职业路径，构建了女性从私人走向公共领域的制度化范式。南丁格尔的思想与实践，深刻折射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在角色转型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也以开创性的制度实践推动了女性社会角色的重塑，为英国近代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与思想启迪。

关 键 词： 维多利亚时期；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护理职业化；女性主义；公私领域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Nightingal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ddle-Class Women's Roles in the Victorian Era

Bai Ruyu

Institut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foundly reshaped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gender order in Britain.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the separated spheres confined middle-class women to the role of "domestic angels", while social transformation brought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to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gender barriers and enter the public domain. For a long time, academic research on Florence Nightingale has mainly focused on her development in the nursing profession and humanitarian spirit, but few hav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history her professional predicaments and individual struggles in a male-dominated social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her practi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of middle-class women in the Victorian era.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edited by Lynn McDonald as the core historical material, combined with contemporary documents. It examines the support and constraints Nightingale encountered in her family,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adictions of her feminist thought,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female roles through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nursing practi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Nightingale's family provided material, knowledge and social connections, but also became the primary constraint for her to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gender norms. By centering on nursing professionalization, she broke the binary gender opposition, opening up a respectable career path for middle-class women and establishing an institutionalized model for moving from the private to the public domain. Nightingale's practice profoundly reflecte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her era and promoted the reshaping of women's social roles, providing an important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 British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Keywords： The Victorian Era; Florence Nightingale; nursing professionalization; feminism;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引言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是英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处于工业革命之后的快速发展期。英国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文化思潮等多方面经历着剧烈变革。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不仅彻底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更对原有的社会阶层划分与性别角色分配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这一时期，随着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尝试参与到产业劳动、慈善救济与社会改革活动中，女性的社会角色逐渐尝试突破传统家庭领域的限制，向公共领域拓展。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作为维多利亚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精英女性，以“提灯女神”和现代护理学奠基人的形象广为人知。南丁格尔出身于极其优渥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却突破家庭与社会对女性的传统期待，投身于当时被视为低贱职业的护理行业。这种跨阶层与跨性别领域的选择，深刻反映了当时中产阶级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挣扎与突破。

国内外对南丁格尔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切入视角各有侧重。国内针对南丁格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她的护理学理论与临床实践上，如耿兆瑞详尽考证了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战地医疗经历和人道主义贡献^[1]。相比之下，国外学者的研究视域更加多元。埃德温·W·科普夫（Edwin W. Kopf）提出南丁格尔不仅在护理领域有着卓越成就，更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统计学家，她通过系统收集和分析数据，在军事卫生、医院管理及公共卫生等多领域推动了社会改革^[2]；在性别史叙事中，桑德拉·霍尔顿（Sandra Holton）探讨了南丁格尔如何巧妙地将护理学与护士岗位同“母性”、“顺从”等女性特质进行绑定，以此换取职业合法性^[3]；伊莱恩·肖瓦特（Elaine Showalter）则侧重于对南丁格尔早期私人写作的文本分析，折射出她对女性在当时压抑状态的深刻反思^[4]。此外，由林恩·麦克唐纳（Lynn McDonald）主编的16卷本《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全集》收录了大量从未公开的日记与书信，为还原南丁格尔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5]。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关键期，工厂集中生产取代了家庭作坊，“家庭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空间隔离开始出现。男性进入社会拼搏并掌握话语权，而女性则困于家庭之内、成为必须保持纯洁与服从的“家庭天使”^[6]。本文从南丁格尔本人的人生轨迹出发，以她在职业选择过程中遭遇的阻力与思想变化为线索，剖析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普遍存在的性别矛盾，以及中产阶级女性在时代转型中的结构性困境与制度化突破。

一、家庭中的南丁格尔

家庭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人生中扮演着极为矛盾的角色，它既是奠定其事业基石的资源宝库，又是禁锢其个人抱负的牢笼。

从资源保障的角度来看，南丁格尔家族所积累的庞大财富与社会资本是其事业起步不可或缺的前提。南丁格尔的父亲威廉·爱德华·南丁格尔（William Edwar Nightingale）出身名门，毕业于剑桥大学，精通数学、自然科学及多国语言。其母范妮·南丁格尔（Fanny Nightingale）同样出身底蕴深厚的贵族世家，家庭世代行善，在政界与乡里颇有名望。这种丰厚的资财与极高的社会地位，为南丁格尔提供了优渥的物质生活，使其得以脱离下层女性需谋生的传统路径。正如南丁格尔在1851年所言，她已“充分体验了英国本阶层的最佳生活”。

早期，南丁格尔接受了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教育，家庭教师萨拉·克里斯蒂（Sarah Christie）的教学重心在于非正式对话与引导女孩“寻找自我”。这种缺乏学术深度的教育模式在当时上流阶层极为常见，因为女孩受教育的最终目的只是“为谈情说爱做准备”，以期未来更好地服务于家庭。在克里斯蒂离职后，父亲威廉接手了对女儿的教育。南丁格尔开始接触拉丁语、希腊语、化学甚至哲学理论。同时，威廉对统计学的热爱也启蒙了南丁格尔，使其日后在男性主导的医疗与公共卫生领域能够用数据作为工具据理力争。

母亲范妮在庄园管理上的言传身教也深刻影响了她。范妮要求女儿详细记录每周零花钱开支，并让青春期的南丁格尔深度参与庄园的物资统筹等繁琐事务。爱德华·库克指出，南丁格尔骨子里“继承了母亲的组织能力”。母亲资源优化的理念与管理底层仆役的经验，为

南丁格尔日后主导护理改革、以铁腕手段管理医护团队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女性还有家庭“社交装饰”的作用，严苛的礼仪规范限制着她们的行为与意志，她们的生活活被各类不成文的社交规则所捆绑，毫无自主空间。在这一时期，中产以上阶级的女性必须通过参与社交活动，展现家庭的教养与地位，而其自身意愿则完全被忽视。南丁格尔对这种被迫陪客、毫无自主权的生活深感窒息，将其比作“双手被缚，仰面躺着，任由液体灌入喉咙”。更为隐蔽的压迫是对思想的监控，在家庭活动之余，中产阶级的女性还要与亲戚朋友不断保持通信，而家庭成员间传阅女性私人信件则成为常态。南丁格尔尖锐地批评这种被迫“回复那些所谓朋友的无谓来信”的社交法则，实则是社会阻止年轻女性专注思考、学习或工作的另一种手段。对私人通信的监控，本质上是对女性思想独立的压制。

在这样的社会规则和由此延伸出的一系列家庭活动对女性的要求下，南丁格尔感到格外疲惫与焦虑。雪上加霜的是，在她决心踏上护理事业的这条道路上，最大的敌人反而是她的女性至亲。母亲范妮将家族体面视作底线，当1845年南丁格尔提出接受护理培训时，范妮表现出强烈的抗拒，甚至恶意揣测女儿与“粗俗低级的外科医生”有染。姐姐帕特诺普的阻挠则带有隐性竞争与情感依赖的意味，当南丁格尔从德国考察归来，帕特诺普以“被抛弃”为由数月精神崩溃，迫使南丁格尔留家陪伴半年；1852年，帕特诺普更以南丁格尔的行为导致她“濒临死亡”为由阻挠南丁格尔，直到御医建议南丁格尔脱离家庭才暂告一段落。即便南丁格尔已经正式开启职业生涯，仍频繁遭受姐姐以家庭需要为由的骚扰与否定。家庭的阻挠与压迫，促使南丁格尔在痛苦的挣扎中，逐渐形成了既务实又充满时代矛盾的女性主义思想。

二、南丁格尔的女性主义思想与实践

部分历史学家曾基于严苛的标准，试图将南丁格尔从女权主义者的行列中排除。雷·斯特雷奇（Ray Strachey）指出，她“对于有组织的妇女运动，仅抱有一种不完整且易耗尽的同情”。南丁格尔拒绝签署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提交的女性投票权请愿书，并在日记中表露过对女性群体的失望，认为自己的事业“在女性中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甚至“从未找到一个女人曾为我或我的观点而改变自己生活的一丝一毫”。面对当时只停留在口头呼吁的女权运动，她讽刺那些只参与公共写作的平权者是毫无用处的“女性墨水瓶”。然而，这种充满个体情绪的文字碎片，并不能否定其女性主义思想的实质内核。理解南丁格尔，必须看到她在漫长追逐独立职业之路上遭受的同性群体的孤立与至亲的围剿，这使得她对“沙龙式女权主义”充满不信任。

南丁格尔的女性主义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从未停留在理论批判层面，而是通过在医疗护理这一领域的实践，推动中产阶级女性角色转变。她敏锐察觉到缺乏专业技能是导致女性依附男性的死穴，因此将极大精力投入到女性的职业教育和就业保障中。她坚持让女性在护理管理层占据绝对领导地位，倡导建立保障护士权益的“护士之家”。她在实践中付出了很大努力，从改进战地医院、撰写《护理札记》，到运用“极区图”游说政府推动军事医疗改革，再到利用公众捐款创办圣托马斯护士学校。这所学校的建立不仅标志着现代护理教育的开端，更是护理事业走向全面专业化的伟大起点。

南丁格尔的突破在于，她巧妙将当时社会认可的女性特质，如母性、同理心，与不可替代的专业技术能力，如卫生统计、病理观察进行了深度融合。这一举动击碎了“私人领域属于女性，公共领域属于男性”的二元对立。她将护理从由底层妇女从事的“低贱体力服务”成功升华为受人崇敬的公共卫生事业。这使得中产阶级女性无需背负背叛性别的枷锁，也无需放弃阶层认同，便可名正言顺地进入社会工作。

三、同时代中产阶级女性的角色选择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会发现南丁格尔的实践并非孤立的历史偶然，而是维多利亚中晚期受过教育的女性群体试图集体冲破性别隔离的时代缩影。这一时期，性别意识形态在不同领域呈现出错综复杂、不平衡发展的演变态势。通过横向对比同时代女性的不同路径，能更清晰地透视中产阶级女性在角色转变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

大量中产阶级女性倾向于在不触动根本性别权力秩序的前提下参与公共事务，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活动成为最稳妥的选择。萨拉指出，这类业余慈善是“中产阶级女性在不突破严苛性别规范前提下的安全情感选择”。它看似让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实则强化了女性无需专业能力、只需依附家庭的传统认知。尽管普罗查斯卡（F. K. Prochaska）认为这在客观上为女性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行政管理经验，催生了“社会母职”的话语体系，但它依然被视为女性私人情感的无偿延伸，缺乏明确的职业规范与经济报酬。多数女性在慈善网络中仍处于业余和从属地位。南丁格尔的卓越之处在于她拒绝了这种“业余的善良”，将护理业重塑为一门需要专业技能与薪酬保障的现代职业，从而完成了从“施舍者”向“职业管理者”的跨越。

审视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女性的多元选择，南丁格尔的核心贡献在于“制度化的确立”。多数同时代女性的反叛往往依赖个人天赋或家族财富，缺乏可持续的职业复制路径。而南丁格尔强调女性必须获得工作的权利。她不仅凭借个人魅力名声大噪，更通过建立护士学校、引入统计学工具，将平权的诉求固化为有法可依的制度现实。正如麦克唐纳指出的，南丁格尔的伟大在于她将“女性可以进入公共领域”的想法，变成了“女性能够稳定留在公共领域”的现实。

不可否认，受限于时代，南丁格尔的实践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她将护理与“耐心、同理心”等女性特质深度绑定，甚至在《护理札记》中强调护理是“女性天生的使命”。这虽然为女性进入该领域提供了合法性，却也强化了对女性的偏见。桑德拉指出，这种“选择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职业领域的性别分工，更具权力的医生领域仍对女性紧闭大门。雷·斯特雷奇则认为，她对妇女运动的“有限同情”，本质上是既想突破私人领域束缚，又不愿彻底挑战男性政治秩序的矛盾选择。

四、结语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一生，是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女性角色转型的一面多棱镜。她置身于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既深受惠于上层中产阶级家庭提供的精英教育与物质庇护，又饱受传统性别规训的困扰。面对这一结构性困境，南丁格尔并未止步于个人的精神内耗，而是以务实的姿态，通过护理事业的专业化与制度化，为中产阶级女性打造了兼具体面与价值的职业路径。

从社会性别史视角，南丁格尔的个案折射出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角色转变的悖论。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进程虽然为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但“家庭天使”的意识形态依然是一道无形的枷锁。南丁格尔及同时代的先行者们，往往在反叛传统的同时又不得不借用传统的某些叙事来换取实践的合法性。她们既是传统秩序的受害者与突围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旧有伦理的妥协者与继承者。这种选择性突破与局限性，不仅是南丁格尔个人的思想羁绊，更是维多利亚时期性别观念尚未突破的时代缩影。

参考文献

- [1] 耿兆锐.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与克里米亚战争[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20, 33(6): 108-113.
- [2] Edwin W. Kopf, "Florence Nightingale as Statistician,"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15, No. 116, 1916, pp. 388-404.
- [3] Sandra Holton, "Feminine Authority and Social Order: Florence Nightingale's Conception of Nursing and Health Care", Social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No. 15, GENDER AND SOCIAL LIFE, 1984, pp. 59-72.
- [4] Elaine Showalter, "Florence Nightingale's Feminist Complaint: Women, Religion, and 'Suggestions for Thought'", Signs, Vol. 6, No. 3, 1981, pp. 395-412.
- [5] Lynn McDonald,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 [6] 曾亚英.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家庭天使”的内涵和特点[J]. 达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4): 120-121+124.